

文物之韵 鸟兽之歌

——读《此间鸟兽：文物里的中华文明》有感

□高低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以其独有的智慧和创造力，编织出一幅幅无与伦比的灿烂文化画卷。历史文化学者任疆，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和美国康奈尔大学，其新作《此间鸟兽：文物里的中华文明》犹如众多探寻中华文明深邃内涵著作中的一把钥匙，轻轻旋转，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通往古老智慧与浪漫情怀的神秘之门。

本书中所呈现的300余件文物，被收藏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在书中，每一件文物都超越了其物质形态，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与灵魂。龙，不再是壁画上冷峻的图腾，而是化身为一枚枚穿越时空的智者，用其悠长的胡须轻抚历史的沟壑，低吟着千年的智慧与沧桑，恰如马克·吐温所描述的那样：“历史不会重演，但总会惊人地相似。”而凤，则成为了优雅的舞者，身披七彩霓裳，在青铜器的边缘

轻盈起舞，每一次展翅都闪耀着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与不懈追求，让人不禁想起庄子笔下“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壮丽景象。

在作者的笔触下，时间仿佛被赋予了魔力，变得既夸张又生动。读者仿佛能在一瞬之间，穿越到那个神巫交织、巨兽腾空的远古时代，亲眼见证祭祀之火中巨兽的腾空而起，其吼声震耳欲聋，令山河震颤，展现了古人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与崇拜。而在礼制社会，那些玉器上的鸟兽更是夸张与斑斓的极致，它们不仅是权力的象征，更是古人对美好愿景的极致追求与艺术创作的巅峰之作。

雨果曾言：“历史是什么？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1991—1995年，我就读于中山大学。1995—1998年，在广州媒体工作。1981年6月底，作者父亲从广州带回电视机、易拉罐。易拉罐里装的是蔗汁。作者说，富顺的甘蔗我吃得多了……绝对无法提供这罐子里那种既清爽又甜到有点发齁的奇特风味。嗯，这就是来自广州的馈赠。

的鸟兽意象如同璀璨的珍珠，串联起中华文明的辉煌篇章。它们或威严如狮，彰显君王权威；或灵动如鹿，传递自然和谐；或纯洁如鹤，寓意长寿高雅。每一幕场景，都是一幅生动的画卷，缓缓铺展在我们面前。

文载于物，族随附间。运脉牵连，兴者兼见。上万年的时光岁月，不断变化的动物角色与意象在文物上慢慢沉淀。《此间鸟兽》不仅是一部关于文物的书籍，更是一次心灵的深度旅行。它让我们在赞叹古人巧夺天工的同时，也深刻体会到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与深远影响。这些文物上的鸟兽意象，如同跨越时空的信使，连接着过去与现在，让我们在欣赏美的同时，更能感受到那份穿越时空的情感共鸣与文化自信。正如作者所愿，这本书将成为一座桥梁，引领更多人走进中华文明的宝库，共同探索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美丽与智慧。



《此间鸟兽：文物里的中华文明》
作者：任疆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7月



□甘武进

“富顺，我诞生之地。祖母的故乡。1949年祖父全家六口迁此，姑姑和两位叔叔在此出世。我是家族里最后一个在富顺长大的孩子。”“我的好友邱小小说：‘杨早一写富顺就是个文学家，一离开富顺就只是个评论家。很奇怪。’”在《城史记：我读过的十座城市》这本书里，作者如此叙述令人产生浓厚兴趣：这个地方除了出盐，也出过才子，明代有熊过，清代有刘光第，民国李宗吾和陈铨。

作者杨早，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作者选择了从童年到当下与自己发生联系的十座城市：富顺、成都、广州、北京、天津、高邮、南京、上海、西安、合肥，阅读它们，思考它们。从熟悉的街头、生活趣闻、文献档案去揭开城市的过往，拼

贴出一幅生动的城市图景，不经意地抖落出一人、一条街或一段历史。作者举重若轻又妙趣盎然的笔调，让读者在愉悦的阅读中产生共鸣，一座座城市的样貌、性格、味道都因此变得活灵活现。这透露出《城史记》的一种书写原则。事实上，这十座城市都是与作者发生过“联系”的重点，在于“我”的介入。

“成都，母亲的故乡。我在这读了小学、中学。”“民国时，我来到成都的，都一口咬定，成都像北平。先贤们说得虽有道理，但在直觉上，作者从未觉得住过四年的成都，与已住了20多年的北京，有多少共通的地方。”“威远老乡罗念生的比喻我比较认同：‘燕京城像一尊武士，虽是极尽雄壮与尊严，但不免有几分粗鲁与呆板；芙蓉城不像一个文人，说不尽的温文，数不完的雅趣。’”关于成都人，作者总认为成都更像上海，它们都有一种女性的味道：上海每每被笑谑为“小男人之都”，成都也盛产怕老婆、会做菜菜的“耙耳朵”。

“打开父亲给我带的礼物。细长的金属罐子，天气很热，摸上去

人与城市的遇合，值得记录

——《城史记：我读过的十座城市》读后

多少有点凉意，头上有个拉环，一使劲，开了！喝了一口，妈呀！这是什么美味啊！清甜……甜……回味……还是满口的甜！”1979—1982年，父亲在华南师范学院读研究生。1991—1995年，我就读于中山大学。1995—1998年，在广州媒体工作。1981年6月底，作者父亲从广州带回电视机、易拉罐。易拉罐里装的是蔗汁。作者说，富顺的甘蔗我吃得多了……绝对无法提供这罐子里那种既清爽又甜到有点发齁的奇特风味。嗯，这就是来自广州的馈赠。

高邮是作者的祖籍所在。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去高邮肯定不是被旅游景点吸引，毕竟扬州、苏州、南京这些重点旅游城市都离得不远。他们大抵是奔着文化名人来的。“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本是高邮的两张名片，而汪曾祺在当下的阅读热度方兴未艾。很多“汪迷”心心念念，想亲身来看一看《受戒》中明海出家的菩提庵，《大津记事》中的大津……或许看了后，多少会有些失望，但正如“顶级汪迷”苏北所言，小说里的地名与人物立时变得鲜活起来，不再是凭空想象。

“我是习惯把西安呼作长安的。”“长安”这个词似乎很有些魔力，念起来禁不住悠然神往，一句“举头见日，不见长安”能让人想上好半天。它的情意总是从每一块砖瓦中氤氲出来。每一个中国文人，都怀着朝圣的心情到来，带着惘然的感慨离开。“我辈岂是蓬蒿人”“拔剑四顾心茫然”李白、王维、杜甫……都来过，又都走了。这些文豪或短或长的驻留，为霸气四溢的长安添上了颇为浓厚的文化色彩。

阅读城市是比生命更漫长的历程，在生命不同阶段遇见不同的城市，能看见不一样的风景，燃发不一样的火焰。观察它，思考它，感受它，人与城市的遇合，值得记录，也值得分享。“那些我过去过的、想去的城市，都在我的书架上，什么时候抽出来阅读一两段，补几条笔记，划上后续的折痕。像呼吸一样自然，像购物一样疯狂，像生分一样无情。”作者对城市爱憎分明，与居住时长无关，喜欢或厌恶，都是个人与城市遇合的回响。



编辑推荐：

神话是世界文化的“最大公约数”，是过去的科幻、未来的源泉。

重庆出版集团新出版的《昆仑之书：限量珍藏版》全面、系统、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中国神话主角“昆仑”，串联起中国上古神话。书中内容取材自《山海经》《淮南子》《神异经》《太平御览》等历代古籍，结合近现代以来的神话学研究成果，进行了故事化提炼和加工，全景式、视觉化呈现昆仑的地理、历史、文化、风物、传说，兼具知识性、故事性和艺术性。上百种山水传说、神人鸟兽、仙花异草，150余幅具有中国古画DNA的纯手绘插画，复原了“万山之祖、万水之源、众神之乡”昆仑山的神秘气象。

□巫新华

早期昆仑，以山崇拜形式作为核心文化象征曾遍布广域中国大地各处。随着“中国文化圈”和“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以及对黄河溯源的探索，昆仑逐步西延。昆仑西移，是大一统国家发展的需要与安排，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国家文化与政治举措。

3000多年前，穆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丰隆之葬……见（帝女）西王母”。此时，昆仑早已是西域大山，西王母只是西域地方首领。周穆王西巡昆仑，以天子（帝子）身份接见同宗同祖同一文化传统的西域地方首领（帝女）西王母等活动，表明昆仑这个古代中国地理山脉与文化象征性神山，连同西域与西王母，都已经深深地烙印了中国权属。

两千多年前，《史记·大宛列传》有载：“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水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汉书·西域传》记载：“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于阗河北流与葱岭合，东注蒲昌海……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据此证明，汉武帝钦定西域南山为昆仑，是国家确定昆仑与黄河源头的举措，明确昆仑所在即为天下所至，中原、西域同饮中国河（黄河）水，早已是天下一家。《汉书·西域传》还有记载，表明西域南山东出金城（今兰州），与汉南

山（终南山）为一脉，昆仑不是今天地理学概念大地构造之山脉，而是一条文化山系。

地理学上，把秦岭、祁连山、昆仑山称为“秦—祁—昆”造山带，又称为中国“中央造山带”。从中国宏观地形区划特征来看，也称为中国中部的“中央山系”，包括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昆仑山脉、阿尔金山、祁连山、秦岭、大别山、太行山等，是中国西部到中东部高山集合体。历史地看，地理学上的中国“中央山系”与中国文化精神的“昆仑”完全一致。

汉武帝经营西域依据于关河（河套），钦定“西域南山”为“昆仑”，历史逻辑在于古代西域作为亚欧大陆交通“总揽万国要道”的特殊地理条件与区位，即为陆路丝绸之路主要通道。

“西域”之名，源于“四方”与“四土”，以及“天下观”。因西域地扼中国对外交流的唯一陆路地理交通出口，西域大山脉自然成为文化昆仑比附之地。因而，西域乃国之西域，昆仑为天下昆仑。

昆仑文化认为，天是一个巨大的圆形存在，覆盖在地上，一切都在这一空间之内。从高度上看，一切都处于天的下方；从广度上看，整个世界都为天所笼罩。“天”指的不只是大自然的天地，它实际上包括了自然、民众、社会、祖先、世间万物的一种汇聚。这直接导致了一个“天下”的认识，也导致“天下一家”观念的出现。

这样的昆仑，被比附为“帝之下

都”“百神所在”，三皇五帝、华夏先祖、西王母居地，因而也是一座神话之山。

昆仑有虚实之别。既是天人合一通天之圣山的文化象征，又是观象授时、封禅祭天的明堂。

昆仑是一座玉山。“玉出昆岗”，玉是中国文化最早用来沟通天地之媒介，玉文化开始于九千多年前。和田玉作为中国历代王朝确认的国玉，重要性很早就被提升到国家治理的政治高度和国家认同的文化维度。

昆仑还是道教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之上，最重要的仙山，也是佛教须弥山所在，是佛教进入中国的第一站。

巍巍昆仑，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昆仑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顶级的概念，昆仑山系辽阔、雄浑、连绵不绝的地理尺度，实际上也是中华文明的尺度。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该文为《昆仑之书：限量珍藏版》之序，有删改）



电子书、有声书
扫码即可阅读、收听

近悦远来 书香重庆

书评投稿邮箱：cqrjds@163.com



【作品简介】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2019—2022）《雪山大地》，是当代作家杨志军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家在这部作品中深情回望父亲母亲与几代草原建设者的艰辛探索足迹，书写着高海拔地区的时代巨变与草原牧人的精神心路。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生态与发展的主题贯穿始终，全景式地展现了藏族牧民传统社会形态和生活样貌的变迁。

题记：血脉相融，生死相依；因爱而活，向善而生。

□单士兵

“人有病，天知否？”这句话的内涵很丰富。比如，“病”既可以是疾病痛苦，也可能是精神困厄；“天”既可以指向自然天道，也可以拿来隐喻政府权力。

人是自然人，也是社会人。有很多人处在俗世生活的困顿不堪之中，人在大地上，只能活短暂的一生。那么，在社会、市场和现实之间，如何让生命不断向上生长，不辜负作为“人”的价值意义？

不论在哪个年代，为理想而活着，有信仰地活着，才能让生命活出价值。只是，很多人觉得谈理想是奢侈的，谈信仰是虚妄的。于是，灵魂越来越跟不上脚步，也越来越难以摆脱俗世生活带来的多维痛苦。

“时代病人”有一个普遍选择，就是寻找诗和远方，希望能在某个有风的地方，驱散内心浓厚的雾霾。

藏地，就是构建治愈系坐标的重要地理选择。这里被称为“中国最后一块净土”，吸引着无数朝圣的目光。藏地确实是一片超出很多人生活经验的所在，值得投注虔诚的目光。不过，修行并不只是选择某个圣洁地方来安放肉身，而是要让生活和信仰形成生命的协奏曲，来唤醒沉睡于灵魂深处的爱与善，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美好。

在一个能让内心纯净的地方，读懂生活的真谛，才是关键。这就需要文化的药引。杨志军的小说《雪山大地》，就尝试将地理、生活和信仰串成生命的音符。尽管杨志军早就凭借《藏獒》这样的畅销书被很多读者知晓，但他似乎很少在“主流文学圈”露脸。事实上，杨志军从来没有被哪一种文学派别或潮流裹挟，他总是独立理性地行走在青藏高原，开垦着自己的“荒原文学”。这种疏离的姿态，让不少人对他感到陌生。正因如此，他以最高票获得最新一届茅奖，让不少人感到有些意外。

文化永远不会辜负真正的坚守者和创新者。其实，写藏地小说几十年的杨志军，早就对自己的创作有过这样的谋划：“藏地小说已经超越了历史和苦难的层面，而是精神的升华，是信仰与现实的抗争。藏地小说跟我在生活和精神上逐渐进步攀升有关系，等到攀升到一定程度，我会把它完全生活化。”《雪山大地》这部茅奖作品，这正是他创作攀升的标志性成果，是一份基于文化信仰而不断创新交付的答卷，让人们看到生活和信仰双向奔赴的极致之美。

不过，在社交媒体上，这部作品有时被作为“主旋律作品”进行过度宏大叙事式拔高，有时又因为“主题先行”被粗暴贬损。这两种评价给这部作品带来很多尴尬与不公，很容易让读者偏离艺术规律，让很多人错过这部好作品。

对《雪山大地》评价出现差异，甚至走向两极，也与当前读者群体分流有关。一部好的作品需要遇见理想读者，一个好的读者也需要遇到适合自己文化审美的优秀作品。对《雪山大地》来说，这种文学寻亲的未来之路很长，但值得期待。

茅奖评选从来就不乏争议，但近几届茅奖作品在质量基本上，是越来越值得信任了。《雪山大地》高票获奖，评委考量的视角显然不会简单停留在题材选择上，而是出于艺术和价值的综合判断。深度读完《雪山大地》，不禁不住地感叹，对这部小说太过傲慢与轻率的判断，真是一种文化过失。

《雪山大地》走的是传统典范的现实主义小说写作路数，不论是结构框架的搭建，还是人物关系的构建，抑或是语言修辞的运用，都沿着传统一脉的处理形式。可以说，这部小说并没有在结构和表达上做大多的创新，平行的空间结构和线性的时间线索，没有给这部小说的阅读设置任何技术障碍。在看似寻常的写法与布局中，作者自信地回归到正大气的表达，尽情释放文字直抵人心的力量。

不得不说，杨志军的语言是有惊艳之美的，甚至刷新了我对这位“畅销书作者”以往的认知：原来这个极擅于讲故事的作家，竟有着如此深厚的文本修辞能力。《雪山大地》带着强烈的生态文学特征。毫无疑问，这种类型的小说典范，很容易让人想到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语言的清新隽永、清丽温婉、干净利落、灵动绚烂，在整个文学界都极具标识性，很少有作家能像她那样呈现绝美的文字。令人惊叹的是，杨志军的文字同样干净到了极致，而且，还带着神秘、沉重、雄浑、壮阔、苍劲和悲凉的独特色彩，似乎每一字句都经过反复锤炼，都寄予着万千情感，都有着深刻的寓意。

大道似简，大巧若拙。杨志军像是在用美工笔和雕刻刀，描绘出草原建设半个世纪

向善而生，人间处处都是雪山大地

物理景观的“山乡巨变”，刻画了几代建设者的心路变迁历程，展示了一个因为信仰而活出人生态度的群像。

这是一群有理想的人，也是一群理想的人；这是一群有信仰的人，也是一群被信仰的人；这是一群播撒文明种子的人，也是一群得到文明滋养的人。

小说里强巴和角巴两个家庭，分别来自汉族和藏族，他们彼此交换了真情，交换了孩子，书写了汉藏融合带来的骨肉相连、血脉相融、生死相依的深厚情谊。父辈的旗帜传递到子辈们的手中，理想和信仰才是代代相传的真正内核。在草原上，他们建起了第一所学校、第一所医院，在雪山大地上开创着各种事业。不论是面对高海拔地区十分恶劣的自然环境，还是面对政治动荡年代各种斗争陷阱，他们始终保持着豁达心态，承担起种种责任，承受着现实的苦难。

小说叙事主体的父亲，是一名支边的汉族党政干部代表，面对雪山大地的精神引领，他把名字改为强巴，让身体和灵魂都融入了藏地。在建校兴教之初，强巴不愿让帮助自己的藏民角巴成为替罪羊，承担起责任，失去了官职；在动荡年代，强巴带领藏民经商致富。恩将仇报的老才让恶语相向，制造出牵连多人的“强巴案”。这一次，强巴仍然选择自投罗网充当“首犯”来保全他人；在建设年代，强巴为保护草原生态、推动城市建设呕心沥血，四处奔波。最终，强巴死在前往工作的路上，端正正地坐在那里，望着圣洁的雪山。

苗苗是强巴的爱人，和强巴有着深厚的感情，是相互扶持的靈魂伴侣。苗苗本是省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苗苗里有着医者的仁爱与悲悯。后来，苗苗医生来到沁沁的小卫生所，把这个原本只给机关工作人员看病的方子，建成了为所面向牧民的医院，给无数人带来了健康与重生，她也成为藏民们心中妙手回春的女菩萨。因为难以忍受麻风病人被遗弃在与外界隔绝的生理离山，她决心到那里去创立麻风病诊疗所。这个不願生死的孤勇救难者，最终也感染了麻风病。在毁容、溃烂、残废的情况下，她依然奔忙在救治病人的路上，最终也累死在战胜麻风病的黎明之前。生别离山，终于从人间地狱变成了人间净土。

“父亲和母亲的故事，是所有在青藏高原留下足迹、洒下血汗、度过青春乃至全部人生的父辈们的故事。”杨志军成功地把他变迁和国家变迁巧妙地联结在一起，呈现了一个个的人物典型形象。

桑杰身为贸易公司董事长不谋私利，将巨额存款全部捐赠给学校；才让放弃国外的优越生活，回归家乡建设草原，劳累过度死于工作岗位；梅朵放弃如日中天的演艺事业，选择去医护被毁容的麻风病人……这样的生死疲劳，印证着强巴曾经的深情告白：“我在心里敬畏雪山大地，跟朝拜是一个样子的，所以不光是今天，我时时刻刻都在朝拜，说到底，工作就是朝拜，需要虔诚，还需要一丝不苟。”

小说中反派人物老才让和盗马贼秋吉的结局，同样令人唏嘘感慨。忘恩负义的老才让，在“特殊时期”对强巴进行构陷迫害，长期对藏民利益进行掠夺盘剥，但最终主动选择让位给强巴，就是为了草原能有更好的明天；盗马贼秋吉喜欢马，盗马为生，年轻时意外杀人，长期活在忏悔中，最后在对自己草原的拯救行动上，选择自尽。

慈悲比自由更重要，悲悯比苛责更有力，救赎比惩罚更值得。

雪山大地，是表达生活和信仰之间关系的极好意象。雪山大地，既是神圣的，也是实在的。雪山大地，是具体的，是地理概念，是阿尼玛草原的景物；雪山大地，又是抽象的，是精神寄托，是人们内心敬畏和守护的价值。

在雪山大地的旗帜下，几代草原建设者传承着理想主义的价值观，以信仰的力量，书写出悲壮而又精彩的拓荒诗篇。他们虔诚地信仰着“爱”与“善”，也在传递着“爱”与“善”。正如杨志军说：“人可以没有宗教，但不能缺少信仰。不是说皈依了宗教就等于有了信仰。皈依宗教是寻找一个集团，而皈依信仰才是真正的神圣出路。我们这个时代并不缺少宗教，而缺少真正的信仰。我们需要一种更加大众化和具有普照意义的道德信仰，一种博爱、泛爱、兼爱的信仰。”

“是什么样的人能在人心里播撒种子？人应该怎样做才能称之为‘人’？”在小说结尾，作者这样叩问。

答案就是：因爱而活，向善而生。让爱洒开来，把善种下去。把星星撒到地上，把星光搬入人心。人间处处，皆是雪山大地。